

正確判斷澳門區情：一個永恆的主題

楊允中*

一、前言

在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事業必然進入更高起點、更高要求的實踐新境界。應該說，作為成功實踐合格載體，澳門特區第一個 20 年有望被認定為一個肩負改寫歷史、拓新歷史使命的“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堅定執行者、有效捍衛者，當然也必然並應該是新思維、新理念的求實探索者和認真踐行者。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¹ 上述“兩個最佳”表明，“一國兩制”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成功範例，作為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對話對接、對壘對決的智慧選擇，由 20 世紀 60 年代初周恩來推出理論框架“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為：①台灣統一於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委於蔣介石；②台灣所有的軍隊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③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④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²到 80 年代初鄧小平正式予以定型、由構想到現實、由理論到實踐、由成功啟動到基本成熟，這是世紀之交最能體現制度創新與認知深化的超大理論系統工程，它的出現與推進已令傳統政治結論、傳統理論思維、傳統認識論體系難以適從，不得不作出根本性的調整與更新。這項凸顯求同存異、海納百川、平等互尊、互利共贏思維以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我為主、務實創新方針的東方文明原創系統工程，令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或特色中國更加鮮明具體，更加可親化有感化，從而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開放性、創新性、獲益性更為人們所理解所認同。無論在當前還是從歷史發展認定，把人類社會最大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矛盾對立統一在新興特別行政區，且已取得初步奠基性成功，這不能不被認定為大中之大、特中之特，進步中的進步、創新中的創新。

為提升特別行政區示範效應，為力求在第二個 20 年實踐進程中有符合歷史與現實的深度認知，有應該達致並可能達致的驗證成效，此時此刻加大對澳門社會結構優化的理性化思考，包括深化對區情實際的認知，其必要性與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

*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名譽顧問、教授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當下是否存在基本矛盾，其表現形式與內涵實質如何界定？

(一) 矛盾的普遍性

“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家主要矛盾的認定原則上亦應適用於澳門特區，在澳門同樣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一方，照理應該理解成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兩大領域需要。在國家進入富起來、向強起來階段逼近前提下，溫飽型需要已讓位於富裕型需要，而且“日益增長”又永遠不存在終端值。解決矛盾需要一方要緊緊抓住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而解決矛盾供給一方則要對全體人民自身綜合素質的持續提升重視重視再重視。

“矛盾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³大至國家整體、國際關係演進，小至家庭與個人行為，無不體現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迴避性，無不要求通過正確矛盾觀或對立統一觀加以及時疏理、緩和、化解。其中，正確、客觀地認準現存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及時精確地作出對應性舉措，這是一項具普遍意義與價值的客觀要求，對於實行“一國兩制”新政、面對兩大主義對話對接、對壘對決的特區上下更毫不例外。實際上，人類社會及其文明進程中博弈是貫穿始終的一個基本現象，不僅政經領域而且文社領域都如此。政治領域為了“一個”權字在博弈，你爭我奪甚至改朝換代屢見不鮮；經濟領域為了一個“錢”字在博弈，財團之間、企業之間合法競爭之餘強取豪奪司空見慣，家族之間、兄弟之間為遺產之爭打穿頭腦以至對簿公堂亦屬家常便飯；文化領域是與非、對與錯的博弈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既有思想家理論家極力推出各具特色各有優勢的理論體系力圖改變社會現狀，又有平民百姓世代相襲的傳統認知、習俗、禮儀的堅守、調整與更新。

人們通常理解的現代化不僅要有物質領域高指標體系的建立，而且也不能不涵蓋公民綜合素質的穩步上揚。這也是一條永遠望不到終點的持續發展、持續建設、持續成長過程。

(二) 澳門的主要矛盾

澳門近 20 年跨越式發展與內結構的獨特性、不均衡性同時存在，亦即二元經濟、二元社會的結構頗為典型。理論上依然是需求與供給、產出與投入之間的深層矛盾，稱之為新興發達社會的量與質之間矛盾亦應成立。

無論從理論、現實、感情三個維度中任何一個切入，認定澳門業已進入發達社會都是可以接受的判斷。有人抱怨澳門產業結構畸型化，靠博彩維持高發展指標沒有普遍意義。這顯然是具一定理據但缺充分理據的判斷。博彩並非澳門所獨有，而是全球性存在的一種特殊服務產業，在澳門不僅是依法存在，依法經營的特種服務業，而且也是利大於弊、得大於失的主體產業。因而，客觀理性地管好用好博彩業，對特區政府也好，對各界居民也好，恐怕都要進一步過好心理調整關。

澳門社會發展不均衡由來已久。例一，澳門人文發展指數(HDI)高而不均。2016 年為 0.909，這顯然已是不低的指標，但組成這個指數的三要素中，收入指數為 1，預期壽命指數為 0.974，兩者都令人鼓舞，惟獨教育指數僅為 0.771⁴，三者十分不均衡。例二，勞動人口的高教學歷比仍低。據《就業調整》(2017)，當年澳門就業人口總數為 38.74 萬人，其中具高等教育學歷者佔比為 35.5%，初中及小學教育者佔比為 32.3%，高中教育者佔比 29.7%，高等教育者佔比比回歸之初已有大幅上升，但

比起傳統發達國家 60% 以上的平均值仍明顯偏低。例三，澳門近年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年均 1.4 萬件以上，日均 40 件。社會犯罪率與居民綜合素質構成負相關。儘管和諧穩定大局仍可維持，但高犯罪率絕不是發達社會正面指標，其深層次原因顯然在於居民綜合素質偏低，最積極有效治本舉措仍在於系統普及教育工程、提升文化道德素養。

(三) 對應性舉措

新時代澳門一要抓社會結構雙強(強政府、強社會)發展路徑與驅動選擇；二要抓產業結構深度優化，包括博彩與非博彩業同步優化，生產力與生產力關係同步優化。“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定位倡導多年，但理解的到位率與執行的給力度均存探討空間。而推出“一個基地”即“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時不我待。澳門有開埠近五百年中西文化交匯交流的深厚積累，澳門有和諧包容、深度開放的文明歷史傳統，澳門有國際公認的發達指標的有力支撐，澳門更有改寫歷史、多重創新的“一國兩制”制度指引，故精準而清晰地選好發展路徑與實施策略，絕對是更具時代感迫切感的中心課題。

三、總結好第一個 20 年發展規律，是個不容放鬆的大課題、大契機

(一) 八點參照指標

澳門第一個 20 年“一國兩制”實踐大方向、大原則，必須肯定不動搖。這不僅是澳門特區自身的問題，而且也是涉深含全國人民願望、利益、要求的基本國策的大事。有兩個着力點十分突出：一是新政權優越性的驗證，二是發展成效的被認定。

說以下八點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參照衡量指標也許基本上應該成立，說這是澳門特區近 20 年成功實踐經驗同樣可作參考。

其一，**國家恢復行使主權、中央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這是一項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洗刷多年民族恥辱的原則性大是大非，中央全面管治權到位不僅意味着中央管治權威得到應有尊重，而且也要求在新興政權下不允許有意欲挑戰國體政體現象存在。

其二，**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享有並行政高度自治權的特區公權力機關的民本性、愛國性、開創性一時一刻也不容淡化。

其三，**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一國兩制”新制度、新政權其最大優越性是求同存異、化異為同、互利共贏，包括實現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統一。

其四，**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經濟是基礎，民生是驗證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高靈敏度指標。

其五，**治港港人、治澳澳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作為文明發達社會制度建設創新標誌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不僅有能力有辦法而且也有智慧。

其六，**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作為全新先進發展理念的體現，“一國兩制”的創新性、科學性、可行性，不僅要得到全國人民的理解與認同，而且還要在國際範圍內廣受讚揚與嫉羨。

其七，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進入全新歷史發展階段，爭取更高水平“一國兩制”實踐成效，關鍵在於廣大居民通過建立相關新思維新作為令創新常態化。

其八，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全力培育並大膽啟用年輕一代優秀人才，是一項時代課題，同時也不容放鬆非年輕人綜合素質的持續提升。⁵

（二）判斷的精準化

肯定澳門巨大發展變化同時，也應理性而精準地對當前區情有個客觀判定。近 20 年跨越式發展絕不是風平浪靜下實現的。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發展階段，在其發展征途上遭遇風雨十分正常。有風有雨，風在哪裏，雨是甚麼，要力求摸準看清，這是使命、宗旨使然。

哪些是原有資本主義傳遞下來的遺傳基因，哪些是新政權建設過程中的必要學費，哪些是由於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的理解有失精準而造成，哪些是社會主體居民綜合素質偏低以至對傳統和現有優勢的利用開發動力不均，等等，等等，都必須正面面對並作出積極反應。

（三）雙強、雙健之路

推進雙強（強政府、強社會）與雙健（肌體與大腦雙發達）建設還要走一段長路，甚至要付出代價，但這是建設發達經濟、發達社會的必然之路。試舉以下兩例：通常提及的官商勾結是典型的原有資本主義病毒所禍及，海一居事件的前世今生也許可以作出說明；不做不錯、做多錯多的負面公職文化基因亦源自回歸前澳葡管治的負面積累。

四、向第二個 20 年進發：基礎與策略

（一）中央方針十分明確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⁶ 這裏有四個熱點均值得長效關注：

其一是要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

其二是要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其三是要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國家發展快車；

其四是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二）認知上調仍有較大空間

為確保新 20 年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有更高更佳成功率，抓好與基本矛盾認知相關的某些核心判斷十分必要，以下謹提出三點思考：

1. 實踐起點已經被推高。良好的政治定位與國家意識；穩定的財政基礎與民生福祉；愛國愛澳已漸成常態化；穩定、包容、寬鬆等環境因素進一步優化。總之，民主、民生都有不俗的成長。

2. “四多四缺”有待高度重視：一多官場冗員，二多民間山頭，三多低位認知，四多族群政治；一缺公平競爭，二缺公民意識，三缺創新思維，四缺精準理解。其結果勢難不導致社會公正低位化、資源配置失衡化、發展機遇錯配化。

3. 發展思維的針對性調整：當前一段時期全澳社會面臨首 20 年發展規律總結與選好新一屆特區政府兩大重點課題，推進中應力求有所側重。一是民主法治公正化、民本化；二是民生福祉可比化、長效化；三是短板效應收縮化、防範化；四是公民意識普及化、高標化；五是公共權力行使清醒化、明智化。總之，新時代、新征程、新實踐有新要求、新期盼，一代新人也要有新承諾、新關注、新作為。

(三) 消除短板，認知不容遲緩

澳門畸型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關鍵在於趨利避害、歪打正着加以規制、導向，在防範、監控領域作足功夫，當前深入總結賭權開放得失前提下明智而富前瞻性地完成賭牌續期事宜，對特區政府可能是一場全新考驗。

消除社會領域短板應越來越凸顯有其不可迴避性與複雜性。二年之後當全國完成第一“一百年”發展目標時，預期在中國大地上將不再存在貧困地區與貧困居民。作為現有發達指標已備受國際公認的一個發達地區，澳門原有二元結構經濟與社會的不匹配、不協調特徵如何同全國形勢對接，或如何同國際上均衡發展的發達地區對接，恐也值得我們自身以及國家有關方面的進一步關注。在澳門向貧困現象宣戰的同時，加大中產階層的穩定擴編擴容，也是一項不宜再延誤的時代課題。

提升全民綜合素質是澳門未來或下一輪發展中的核心治本工程，在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中其必要性迫切性十分清晰，不言而喻。宏觀上它對新時代新征程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具有直接相關性，微觀上它對廣大居民及其子孫後代的切身福祉和基本權益有效保障亦具不可分割性，故它是利國利區、利民利己，利在當代、益在千秋的一樁大事實事，不容等閑視之。

總之，進入新時代，站在新起點，在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無微不至的關懷、支持下，憑藉第一個 20 年成功實踐打下的基礎，依靠全體居民期望與利益最大公約數，澳門特別行政區絕對有必要、有條件在制度創新大道上濶步前行，在提升“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率基礎上，不斷完善與文明發達社會相適應的各項發展指標，讓國人高度信賴、引以為榮，讓自身言行舉止全面受到尊重。

註釋：

¹ 習近平：《中共十九大報告》，載於《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頁。

² 轉引自楊允中主編：《“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第396頁。

- ³ 《辭海》(彩印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534頁。
- ⁴ 見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2018)，第4頁。
- ⁵ 楊允中：《總結歷史經驗，提升“一國兩制”實踐自覺性自信性》，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1期(總第35期)，第49頁。
- ⁶ 同註1。